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融合研究

魏春艳

(温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摘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融合涉及众多异质主体融合关系的塑造,行动者网络理论有助于融合行动者意图,催生融合效应,进而理顺生态融合行动者互动关系,揭示生态融合内在机制,构建生态融合行动者网络。进一步通过生态融合理念的同化、生态产业关系的重塑、生态命运共同体的打造等路径夯实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融合行动者网络,提升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融合水平。
关键词: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融合;行动者网络;生态文明建设;生态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X3;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3)02-0053-09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3.02.006

The Ecological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Key Ecological Functional Zones Based on Actors Network Theory

Wei Chunyan

(School of Marxism,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Zhejiang 325035, China)

Abstract: The ecological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key ecological functional zones involves shaping the integration relationship of numerous heterogeneous subjects. The actors network theory is helpful to integrate the action intention and give birth to the integration effect, so as to straighten out the actors'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reveal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its integration and construct a network of their actors, further consolidating the ecological integration actors network of national key ecological functional zones through the assimilation of ecological integration concept, the reshaping of ecological industry relations, and the building of ecological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to improve the zones' ecological integration level.
Key words: national key ecological functional zones; ecological integration; actors network;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ecological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一、引言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

心和必须坚持的原则,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关系全国或较大范围区域的生态安全,是构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支撑。生态功能区的典

收稿日期:2023-01-12
基金项目:2022 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军人才培养课题(引进人才支持)浙江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改善之路(22YJRC12ZD-3YB)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魏春艳(1983—),女,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生态哲学、技术创新等研究。

型特征是生态系统脆弱或生态功能重要,因此如何通过构建持续的融合关系网络,实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融合,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已成为学界的研究重点。

从生态学角度讲,国家重点功能生态区的生态圈是在不断运动变化中保持着相对平衡和稳定的、复杂的巨系统,因其承担的主体生态功能使这种巨系统的平衡变得十分脆弱。在建设国家重点功能生态区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以“人是自然产物,生存于自然之中”的态度,重新考虑持何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且以行动者的身份主动与自然和解,消除传统意义上人与自然的对立,走向融合。这种融合可以理解为“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要素之间在复杂的联系与作用中所具有的一种以趋同性为‘中介’所链接的彼此相向和(或)彼此协调的‘关系状态’与作用过程”^[1]。生态融合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生态命运共同体,“这个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要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必须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2],这符合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将社会关系纳入人与自然的探讨,强调自然、社会和人三者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但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融合涉及广泛的异质主体,如何促成这些异质主体形成融合共生的良性生态网络,需要一种具有强大构建异质共同体能力并且兼具宏观与微观系统运行解释力的理论工具。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 ANT)能够有效阐释复杂网络和空间关系,为研究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融合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同时为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中的生态融合研究提供了分析工具。

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融合网络与行动者网络的内在契合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融合是复杂的“关系”向度体系,异质主体通过互动关系联

自然、社会和人,建构起一张“无缝之网”,催生出生态融合的演化图谱。生态融合的“无缝之网”与社会学中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不谋而合,该理论提出社会是由诸多异质主体构成的复杂关系网络^[3],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一定场域空间内不同要素联结与组合的动态循环过程^[4]。行动者网络理论是有效分析局部社会关系网络建构中异质主体互动关系与利益动机的有效工具^[5],能够阐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融合微观的主体行为特征与宏观演进机制。本文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生态融合建设为例,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深入泰顺县进行实地踏勘、深度访谈、搜集部门资料并整理分析,旨在通过深入田野掌握第一手资料,考察泰顺县生态融合的实际状况。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分析手段,将行动者、转译和网络^[6]植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融合之网,梳理生态融合行动者互动关系,探索生态融合机制,在此基础上构建生态融合行动者网络。

(一)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融合的“行动者”:多元主体

泰顺县位于浙江省的最南端,地处温丽宁三市交界处,是国家生态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与周边县(市、区)共同构成华东重要的生态屏障。泰顺县生态融合的背后是一个以地方政府为关键行动者的异质行动者网络,行动者依照生态融合这个“共同缔造”点,以一种趋近关系完成异质主体之间作用和功能的互补,反映出生态融合中异质行动者之间彼此协调的功能状态。因此,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融合的行动者是多元的,包括以泰顺县政府为主的生态建设决策者、以村民为主的生态功能区内部生态融合实践者、生态融合的外部参与者——社会组织、投资企业等,还涉及区域内自然生态环境、古建筑及村落景观、地域文化传统、政策法规等因素,实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融合应当将人(human)与非人(non-human)行动者共同纳入其中。

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代表学者拉图尔(B. Latour)在人与非人行动者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广义相对性原则”(general symmetry principle)彰显自然存在物的主体地位,并且将“网络”概念解释为:“网络这个词暗示了资源集中于某些地方——节点,它们彼此连接——链条和网眼;这些联结使分散的资源结成网络,并扩展到所有角落。”^[7]“网络”解释力的深入将人类和自然存在物以同等的主体身份并入所要研究的场域,随着社会实践领域的拓展,如今我们认为,任何具有异质性特征且能够改变事物状态的因素都是行动者^[8],行动者范畴的拓展消除了人与非人行动者的界限,解除了行动者领域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避免了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融合研究中行动者身份陷入传统社会学和哲学关于自然和社会、主观和客观之间二元对立的划分,通过生态融合实践重塑自然和社会的关系,并将自然、社会和人作为主体并看成一个有机整体,异质行动者成为生态融合网络中的要素,具有平等的行动者地位,拥有选择生态空间、共享生态红利的权利,同时也必须遵守生态道德准则和承担相应的生态责任,从而为生态功能区场域中生态空间、生活空间、生产空间、社会空间及文化空间等多维空间中多元行动者的新型“融合”关系奠定条件。

(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融合的“转译”:行动参与主体赋能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融合是一个社会建构过程,融合性揭示了异质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状态,但是这种关系状态的形成,不是行动者自觉进入网络并发挥作用,而是行动者必须经过“生态融合”这个“共同点”。“生态融合”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的“系统目的”,这个“系统目的”在政策层面上讲是显性的,但是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中,它“埋置”在人与非人行动者的结构之中,这就需要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转译机制将异质行动者联通起来,行动者不是中介的身份而是转译者,任何新信息在行动者这里都会发生转化,转译是行动者网络的核心内容,包括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与动员几个转译基本环节^[9]。在转译初期,所有行动者的利益问题都聚集到强制通行点(Obbligatory Passage Point, OPP)^[10],通过中介得以形成集体共识,从而使不同的行动者认识事物或行动的意义。行动者之间经过转译参与到生态融合的建构之中,从而将“埋置”在自身结构之中的生态融合意愿激发出来,在转译过程中行动者重新界定各自身份和行动逻辑完成主体自身的赋能,为行动者网络动态运行积蓄动力(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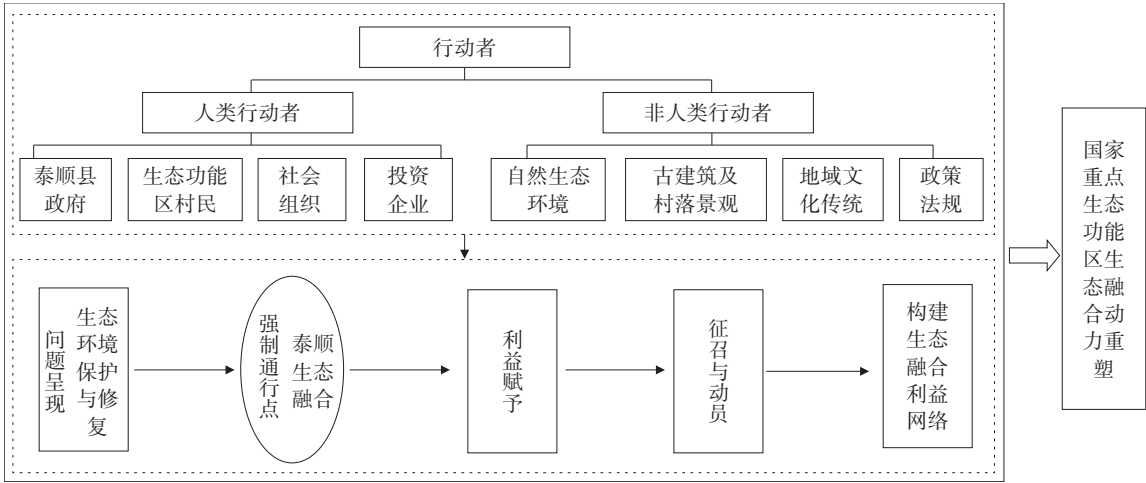


图1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融合行动者网络分析图

首先,问题呈现与利益赋予。泰顺县政府面临的问题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主要支持生态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坚持严格准入、限制开发,实行更有针对性的产业准入和环境准入政策与标准,提高各类开发项目的产业和环境门槛”^[11]。政府希望通过生态融合兼顾生态利益与长远发展,以生态农业、生态产业为抓手促进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生态功能区村民的问题呈现为集体经济薄弱,生态大搬迁之后村庄发展乏力,希望通过生态修复推动美丽乡村建设,改善生活品质,以经济、民生和社会利益为主要诉求;企业的问题呈现表现在生态农业和生态产业方面,并希望在新兴科技产业中能够既提高生态服务又可以通过生态产品的生产获取经济效益;非人类行动者则希望通过生态保护与修复实现潜在价值,主要表现在古建筑群和乡村景观“活化”、地域传统文化“重焕新生”等方面,主要以追求生态价值为目的。

其次,征召与动员。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融合是一项复杂工程,具体实施只能由政府主导,而且必须由浙江省人民政府与温州市政府及泰顺县政府上下形成合力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征召与动员。一是政策动员。浙江省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建设“重要窗口”,注重山区县(市、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注重拓展“两山”转化通道、融入新发展格局。泰顺县全面步入生态文明建设的黄金期、绿色跨越发展的机遇期,抢抓新型城镇化、美丽中国、浙江大花园、“五美”新温州等政策红利,深化生态立县、旅游兴县、产业强县,全力打造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地。行动者随着各级政府的政策指令导向加入生态融合网络。二是实施项目征召与动员。通过招引培育大项目征召异质行动者,比如,以康养文旅为核心的生态旅游业持续壮大,形成生态旅游产业平台,以平台为依托,企业、村民、村居、地域文化等行动者进入关系网络,实现景观重塑、村

容村貌改变和文化内涵提升的效果。三是生态利益相关者征召与动员。泰顺县通过提升全域生态大保护大治理标准,促进美丽城镇、美丽乡村、美丽田园等建设串珠成链,城乡生态环境状况持续改善,通过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疏通生态价值转化通道,泰顺县全域生态环境指标稳居全省前列。这些举措消除了生态融合中异质行动者的后顾之忧,促使行动者形成紧密的利益相关者联盟,从而完成人与非人行动者的全面征召与动员。

(三)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融合的“行动者网络”:创新的新网络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构建的生态融合行动者网络是异质行动者组成的“关系”之网。在这个网络之中,行动者并不是转译之前原定行动者的简单组合,而是处于不同系统中、利益诉求不同的行动者,各自的利益、角色、功能和地位通过网络关系被重新加以界定、安排、赋予,使其利益、兴趣不断趋同,对生态融合理念产生共鸣,通过相互协作达成新网络所要求的目标。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融合行动者网络从场域空间上讲是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混生场域。所以,我们要以一种生态整体主义的世界观,承认异质行动者内在价值的平等性,并且通过注入新的生态价值理念创新生态融合行动者网络^[12]。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融合是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浙江省在努力打造高品质生活方面,提出了建设未来社区“让城市生活更美好”^①的理念。泰顺县将这一理念注入到生态融合行动者网络中,提出未来乡村建设理念。2021年,相继推出了趣村岭北未来乡村、畚乡蓝未来乡村、溪山茶韵未来乡村、未来库村等四个未来乡村试点。其中趣村岭北未来乡村立足美好生活将未来社区建设“三化九场景”拓展为“五化十场景”,即通过聚焦人本化、生态化、数智化、共享化、融合化价值取向,聚力

未来党建、平安、共享、生态、产业、乡建、互助、双创、人文、治理十大场景,助推实现产业美、文化美、治理美、生态美、生活美的“五美”生活^[13]。通过“五化十场景”,岭北村创新了生态融合的行动者网络,目前培育出乌米产业、乡村美食、田园旅居、亲子休闲、研学教育等主题业态,将岭北村打造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美好家园。聚焦长远发展,岭北村致力于突出场景落地,强化整体概念,融入微改造理念和数字技术,通过守好文化内核、保留乡土味、加强生态产业植入、突出富民导向等创新理念,继续编织全景展现岭北未来乡村面貌的生态融合网络。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构建的生态融合行动者网络通过创新理念的不断注入,不仅提升了生态功能区行动者对生态价值的认同,同时通过行动者之间理念的转译过程,加强了网络之中行动者主体间的认同、承认、依存和影响,呈现出协同共生的主体间性的相与关系,生态融合的行动者网络是一种展现生态互融共存的创新之网。

三、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融合行动者网络的践行路径

(一)统合融合意向:生态融合理念的同化

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融合行动者网络中,政府、产业和村民来自不同的系统,有着不同的价值偏好,对同一种类型的生态资源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蕴含认同。生态融合行动者网络要维持异质行动者之间的协同关系,必须建构能够统合异质主体意向性融合的共同话语体系,这是生态融合行动者网络良性运行的前提。生态融合的共同话语体系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问题为核心,从不同层面对生态价值进行阐释和解读,统合政府、产业和村民的融合意向,进而产生相应的生态融合理念 and 解决生态问题的思路与方法。

首先,以价值链为基础整合生态价值认同,重构价值共同体。人生活在自然之中,当自然

环境的恶化超出了人类所能够承受的范围,甚至威胁人类的生存状态时,生态价值就成为了关注的焦点,而生态价值认同的同化却是在对生态资源的价值分析与人类自身发展关联性基础上产生的,“我们应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山峦层林尽染,平原蓝绿交融,城乡鸟语花香。这样的自然美景,既带给人们美的享受,也是人类走向未来的依托。无序开发、粗暴掠夺,人类定会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合理利用、友好保护,人类必将获得大自然的慷慨回报。我们要维持地球生态整体平衡,让子孙后代既能享有丰富的物质财富,又能遥望星空、看见青山、闻到花香。”^[14]这种美好的生态价值追求,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应该作为全体行动者的普遍生态价值认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融合的价值旨归。遵循人与自然共生的价值引领,政府、产业和村民才能共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进而政府、产业和村民等主要行动者达成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生态开发行为准则,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其次,以生态规制为基础整合生态规范,重构生态规范体系。异质行动者在生态价值认同的基础上实施生态融合行动还需要具有共同的生态规范体系,从而固化生态理念认同,规范生态融合行为,提升生态融合的实施效度。生态融合理念的同化不可能是异质行动者之间的自觉行为,生态规制既是一种约束,同时也是生态意向性融合的考量,将自然、社会和人自身都纳入生态融合的考量范围,以这三者的和谐为基础,建构异质行动者共同认可的生态规范体系。根据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环境承载能力的有限性及优化生态功能区国土空间开发的现实要求:一是要把高标准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作为生态规范的出发点,引导异质行动者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并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研究

生物多样性监测指标体系,构建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建设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和监管信息平台。二是要把系统化推进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作为生态规范的实施点,统筹“碳中和”愿景,积极推进“碳达峰”实践,制定碳中和碳达峰路线图;全面节约资源高效利用资源,尤其是健全土地开发生态监管,盘活利用闲置土地;推行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全过程推进生产方式的绿色低碳循环改造,推动生态功能区绿色循环升级,构建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三是要把实现天更蓝水更绿土更净作为生态规范的提升点,在生态功能区内深入实施蓝天行动、持续推进碧水行动、深入推进净土行动、建设全域无废城市。四是要把持续优化生态保障机制作为生态规范的量化点,不断健全生态环境监管监测机制和完善环保考核评价体系。

通过重构生态价值共同体和生态规范体系,形成了一种以生态价值为内核,以生态规范体系为保障圈层的生态融合理念同化场域,在这个场域之中生态融合意向趋近一致,从而建立起一种统一的认同和信任,为生态融合的开展奠定认同基础(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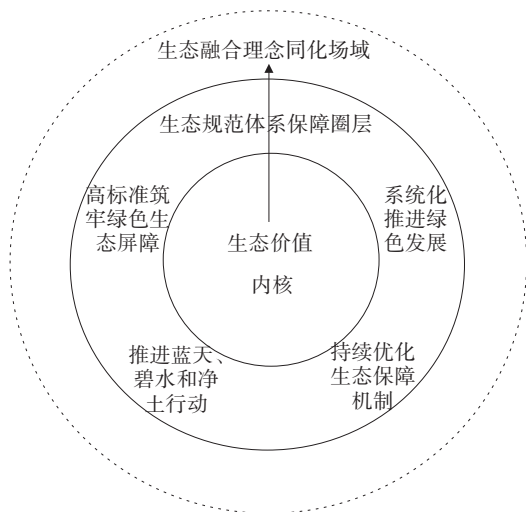


图 2 生态融合理念同化场域形成示意图

(二)消解竞合矛盾:生态产业关系的重塑

从系统的角度看,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场域中,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是既对立又统

一的关系,表现为行动者之间的“竞合关系”,即通过竞争表现出来的对立性是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维系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而合作表现出的统一性是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实现共同目标的基础。现实中竞合关系矛盾的焦点在于如何平衡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内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其实质就是在产业关系中寻找各种利益冲突的平衡点,从而消解竞合矛盾。“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为什么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鱼逐水草而居,鸟择良木而栖。’如果其他各方面条件都具备,谁不愿意到绿水青山的地方来投资、来发展、来工作、来生活、来旅游?从这一意义上说,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15]让绿水青山充分发挥经济效益,要树立生态融合的思路,因地制宜选择好发展产业。

首先,提升旅游质效,打造全域旅游示范区域。依据生态功能区内的生态和景观优势,加快“旅游主业化、全域景区化”进程,优化旅游发展布局,深入推进“旅游+”业态融合发展。以项目建设、平台优化、品牌打造、配套提升为持续发力点,推动生态功能区内旅游资源协同发展,以地域标志性旅游项目为引领,增强生态功能区内旅游竞争力。推进旅游业态融合,根据生态功能区的文化和农业特色,在旅游业态中融合文旅和农旅。用文化元素扮靓旅游景点,用文化作品推介旅游产品,用旅游产品凝集文化精品,深入挖掘生态功能区特色文化资源,做好古村落文化、民俗文化、红色文化等与旅游相结合的文章,构建“名镇、名村、名街、名居”等文旅融合发展体系。充分利用山水生态和旅游资源优势,推动旅游与美丽乡村、特色农业等深度融合,开发休闲采摘、农耕体验、田园观光等旅游业态。

其次,发展绿色有机生态农业,培育壮大特色农业体系。以绿色生态农业为主旨,根据生态功能区内不同区域农业特色,培育“一镇一

业、一村一品”等特色农业项目,增强特色农业竞争实力。招引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支持和鼓励发展以农业龙头企业为主体、农民参股的“公司+农户”模式,大力培育示范性家庭农场、农创客等,加快适度规模经营,规模化打造特色农业产业强镇、特色产业村、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优质农产品示范基地等,增强生态农业的发展基础。

最后,壮大生态产业,夯实跨越式发展。以生态工业为主攻点,以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发展新兴产业为方向,加快打造一批生态产业集群、标志性特色产业链和高能级产业平台,实现空间突破、产业集聚、规模提升,以推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构建主导产业引领的特色产业链,生态功能区的主导产业要高起点谋划、高标准招引培育生态工业,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通过招引培育一批创新能力强、产品附加值高的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加快培育具有生态功能区标识度的特色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引领生态功能区产业跨越式发展,打造生态工业新高地。根据生态功能区的现实情况,优化生态工业体系,有序发展清洁能源产业,拓展新能源应用场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向人工智能、生物制药、新材料等领域延伸,构建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引擎,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全过程推进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

总的来说,要从旅游业、绿色农业和生态工业三个方面重新规划和布局,重新塑造生态产业关系,摸索出一条平衡社会系统与自然界竞合矛盾的新路,深化“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6]的理念认同,创设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从大局观、整体观、长远观进行产业布局和发展的思路。

(三)建构融合模式:生态命运共同体的打造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17](P30)},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恩格斯生命有机体理论进一步阐

释基础上提出的时代论断。根据这一论断,我们要把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人的系统等同起来,因为自然、社会都是自组织生命系统,由自然、社会与人互动而构成的体系必然也是一个自组织生命系统^[18]。基于这种生态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我们要以一种系统的思维方式,立足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整体发展,在统筹兼顾的基础上,打造不同层次和不同行动者之间的生态命运共同体,从而建构起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内部立体式的生态命运共同体空间网络,保障生态功能区从“一时美”到“持久美”的永续发展。

首先,通过新型城镇化,打造城镇生态命运共同体。一是科学规划生态功能区内国土空间功能分区,拓宽城镇生态命运共同体生存空间。科学划定国土空间功能分区,城镇空间重点向县城和各中心镇建成区集中,合理增加城镇建设用地规模,提升人口、产业等承载力,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科学划定生态功能区内农业区,优化农业布局,完善农田水利设施,合理调整村庄布局,增强中心村、特色村人口聚集能力。合理划定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生态公益林等生态功能区,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通过生态功能区内国土空间的重新划分,形成“中心引领、全域联动”的空间发展格局,从而盘活生态功能区内土地资源,使新型城镇生态命运共同体焕发活力与生机。二是通过“大建大美”专项行动,推动新城镇生态命运共同体质量提升。深入实施生态大搬迁,有序引导搬迁人口向中心城区、中心镇等区域集聚,将生态功能区山水生态、特色文化、乡村记忆融入城市建设,促进生产、生活、生态有机结合,推动“产、镇、人、文”深度融合发展,打造更具经济实力、更显创业活力、更添人文魅力的生态新城。科学引导乡镇彰显特色各美其美,“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不要花大力气去劈山填海,很多山城、水城很有特

色,完全可以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17](P30)}。通过实现“一镇一品”差异化发展,持续深化特色小镇、旅游风情小镇建设,推动乡镇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发展多元业态,鼓励抱团发展,形成县域联动美美与共的发展新局面。同时,深化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持续开展环境卫生、城镇秩序和乡容镇貌整治,积极打造美丽庭院、美丽社区、美丽街区,大力提升新城镇生态命运共同体质量。

其次,通过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及乡村公园建设,打造美丽乡村生态命运共同体。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一是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常态开展“最干净、最脏”镇村评选,高品质打造一批“最美乡愁村”。持续推进“厕所革命”,强化农村户厕改造,普及无害化卫生厕所,全面实施厕所粪污同步治理、达标排放或资源化利用,积极建设生态公厕。全面开展农村垃圾分类,全面完成乡村规划设计,巩固无违建县创建成果,全面推进棚户区(城中村)改造和农村危房治理。二是探索最美乡村公园建设。坚持多层次规划、多类别打造、多功能融合,全面优化农村生产、生活、生态布局,高质量打造一批乡村公园。更加注重生态提升,突出乡村山水林田湖草全要素综合治理。更加注重系统打造,统筹推进美丽乡村、美丽田园、美丽河湖建设,加快美丽乡村景观串点成线,加快发展美丽经济。探索建立乡村公园建设标准,由点到面、有机结合,推动城乡深度融合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构建生态命运共同体的意义,通过打造城镇生态命运共同体与美丽乡村共同体,编织生态功能区内部立体式的生态命运共同体行动者网络,人类及其他非生命体在所处自然环境中通过网络连接关系形成有机统一整体,在生态融合统一理念的引导下多样性的生态命运共同体呈现共生共荣的生命运行图景。

四、结论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承载着保障国家生态安全、扩大绿色生态空间、实现全国生态资产保值增值等重要作用,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点区域。因此,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融合是生产、生活、生态、村民和社会之间的综合性问题,是异质行动者通过合作和连接关系的重新定位并达成融合性意向,进而采取联合行动的社会实践过程。

针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融合,本文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创新探索,将社会学研究中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建构生态融合网络相结合,围绕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生态融合建设,分析了生态融合关系网络的多元主体参与特征及其对生态资源的价值诉求,深挖了异质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机制,通过生态创新理念的植入,建构了结构稳定的创新行动者网络,增强了人与非人行动者在生态融合中的协同作用,加深了对生态融合的系统认知。从整体性角度将自然、社会和人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这一场域,从不同系统中的行动者的连接关系入手,在关系向度中建构生态融合行动者网络,能够有效消解异质行动者之间的矛盾,便于形成合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重塑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融合行动者的命运关系,践行了生态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深化了异质行动者在生态融合中的功能和作用,将生态融合关系上升为一种共生关系,使异质行动者能够从自身生存角度更为积极的、持续的进行生态融合,从而为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建设提供了鲜活的实践案例。

[注释]

- ① 袁家军:我们对未来社区的内涵有一个“139”的概括:“1”就是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中心;“3”就是聚焦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三维价值;“9”就是未来邻里、未来教育、未来健康、未来创业、未来建筑、未来交通、未

来低碳、未来服务、未来治理九大场景创新。李玉梅. 未来社区是“让老百姓幸福”的新平台:访浙江省委书记、省长袁家军[N]. 学习时报, 2019-11-25.

[参考文献]

[1] 邹成效, 衡孝庆. 论融合性[J]. 学习与探索, 2016(3): 27-31.

[2] 习近平: 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EB/OL]. 人民网, <http://cpc.people.com.cn/n1/2019/0131/c64094-30603656.html>.

[3] Law J. Notes on the theory of the actor network: ordering, strategy, and heterogeneity [J]. Systems Practice, 1992, 5(04): 379-393.

[4] Latour B.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 network theory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33-38.

[5] Woods M. Discourses of power and rurality: local politics in Somerset in the 20th century [J]. Political Geography, 1997, 16(16): 453-478.

[6] Latour B.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 network theory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22.

[7] [法]布鲁诺·拉图尔. 科学在行动 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M]. 刘文旋, 郑开,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5: 418.

[8] 肖雷波, 王秀. 行动者网络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融合的批判实在论进路[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2): 63-72.

[9] Latour B. Postmodern? no, simply amodern! steps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science[J].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90; 21(01): 145-171.

[10] Callon M. Some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the fishermen of saint brieuc bay[A]. //Law, John (Ed). Power, action and belief: a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C]. Boston: Routledge, 1986: 83.

[11] 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通知[EB/OL]. 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zwggk/2011-06/08/content_1879180.htm.

[12] 陈多闻. 我国生态技术创新的践行困境及实践路径[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4): 16-20.

[13] 温州泰顺: 绘就“趣村岭北”美丽画卷 打造共同富裕未来乡村[EB/OL]. 人民网, <http://zj.people.com.cn/n2/2021/0924/c186327-34929180.html>.

[14] 习近平在 2019 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全文)[EB/OL]. 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xinwen/2019-04/28/content_5387249.htm.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23.

[16]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19.

[17]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8] 衡孝庆. 论生态融合[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20(2): 17-22.